

中法女性主题书写比较研究

——以《一个女人的故事》与《秋园》为例

胡 莎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4年7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4年8月7日; 发布日期: 2024年8月16日

摘 要

《一个女人的故事》是2022年法国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安妮埃尔诺所作。这部作品以女儿的视角回顾母亲的一生, 通过碎片化的记忆书写重新塑造了母亲的形象。《秋园》是由国内一位耄耋素人作家杨本芬所写。该作品于2020年发表, 展示了一位普通女性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如何求存生命。尽管两位作家在文化、教育和生活经历方面有许多不同, 但他们在作品中都描述了相似的主题, 包括对母亲的回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以及对时代背景下集体记忆的追寻。比较主题学是一种研究不同时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背景下相同主题作品的方法, 通过该方法可以探讨两部作品的可比性, 以女性人物形象和主题的分析, 寻找二者背后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

《秋园》, 《一个女人的故事》, 主题学, 女性形象, 集体记忆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male Subjects in France and China

—Taking *Une Femme* and *Qiu Yuan* as Examples

Sha 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 10th, 2024; accepted: Aug. 7th, 2024; published: Aug. 16th, 2024

Abstract

Une femme was written by Annie Ernaux, the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for France in 2022. This work looks back on the life of her m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aughter and reshapes the

image of the mother through fragmented memories. *Qiu yuan*, written by a domestic amateur writer Yang Benfen, was published in 2020. It showcases how an ordinary woman survives in a turbulent era. Despite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life experience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uthors, they both address similar themes in their works, including memories of mothers, reflections on the survival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pursuit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Comparative thematology is a method of studying works with the same themes under different time, ethnic, and linguistic backgrounds.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explore the comparability of the two works, through analysi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themes, to uncover the literary valu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behind them.

Keywords

Qiu Yuan, Une Femme, Thematology, Female Image, Collective Memor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一个女人的故事》的作者安妮·埃尔诺，是法国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该作品发表于 1987 年，以女儿的视角回顾母亲的一生，在碎片化记忆书写中重塑母亲的形象，“以巨大的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体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1]。《秋园》的作者杨本芬，则是国内一名年逾八十的素人，该作品发表于 2020 年，在历史纵向河流中展示了一位普通女性如何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夹缝中求生存。文学的核心在于人类境遇与情感，两位作家虽然在文化、教育以及人生经历中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在作品中均以共同的生命体验和生命形式呈现出相似的主题，即对母亲的追思，对女性生存的思考以及对时代背景下集体性记忆的探寻。目前国内对于安妮·埃尔诺主要围绕自传性、集体性和记忆性的书写，以及代表作《悠悠岁月》的记忆书写和影像化书写展开研究，鲜有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文本分析。而对于作家杨本芬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更具自传性作品《我本芬芳》，对于《秋园》的研究则围绕记忆叙事和女性主义角度展开。当前对于两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平行单向探索，容易使得学者们忽略这两部作品背后共通性与差异性所展示的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价值。主题学滥觞于 19 世纪德国民俗学研究，后延伸至没有直接影响渊源的同一主题不同时空作家笔下的作品研究。主题学是对不同时空、民族、语言背景下的相同主题的比较，它打破时空界限，融会各民族文化，找出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在不同民族作家笔下的不同表现 [2]。主要研究对象有：母题研究、主题研究、意象研究、情境研究、人物形象题材的研究、典型场面题材的研究、地理题材的研究、植物动物非生物题材的研究、传说中的典型题材的研究 [3]。本文将从比较文学主题学视角探讨两部作品的可比性，从女性人物形象和主题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文本分析，探寻其相似主题下所呈现差异化的动力机制，寻找二者背后的文学价值及社会意义。

2. 《一个女人的故事》与《秋园》的可比性分析

2.1. 两者形成过程相似

《一个女人的故事》是安妮埃尔诺在母亲去世三周后的所写的悼念之作，以 1906 年出生的童年成长轨迹、艰难维持家庭生计与子女教育的中年岁月、丈夫去世后的老年生活为脉络，回溯了母亲的一生。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她遭受过饥饿、被父母所束缚过、受到战争的摧残、与子女愈渐疏离、最终孤独的

离世。安妮埃尔诺不仅在书写母亲，也在书写法国社会中诸如母亲这一类人的集体。于时代的浪潮下的她们而言，逆流而上的人生轨迹但凡被阶级与战争的浪花轻轻一推，便会轻易偏离轨道，充满着无可奈何。可是这一集体却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社会浪潮，小心翼翼地让偏离的自我再次靠近原来的轨道。

《秋园》亦是杨本芬女士在母亲去世后开始创作，以一系列历史事件为背景，记录了母亲秋园从五岁裹脚、婚配出嫁、生儿育女、谋生养家、丧子丧偶再嫁、最后叶落归根的生命历程。作者不仅讲述了一位普通母亲浮木般挣扎求生的故事，也记录了中国中南腹地如她一般的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她们的集体记忆，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4]。

于两位作者而言，如若不记下母亲在人间的雪泥鸿爪，那么关于她们的一切便会如案台薄薄的灰尘，不久便被岁月抹去，而关于那一代人的社会性集体记忆也随之消失。悼念母亲以及记录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两位作者创作的初衷。

2.2. 两者写作背景相似

安妮埃尔诺 1940 年出生在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的一个平民家庭，父母本是社会底层的劳工，收入微薄、文化程度不高，为了送女儿上学念书，他们含辛茹苦工作，在诺曼底小城伊沃托经营了一家咖啡馆-杂货店。安妮埃尔诺后来以优异成绩进入鲁昂、波尔多、格勒诺布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一名教师、作家。杨本芬女士 1940 年成长于湖南湘阴乡下，父亲虽是政府文职人员，但是家庭贫寒。在重庆时，跟随父亲回到湖南乡下。尽管战乱等原因让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父母还是倾其所有让子女接受教育以摆脱农耕之苦。杨女士虽然考取岳阳工业学校，但由于学校停办不得已终止学业，为了继续上学，她辗转至宜春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江西农业大学)半工半读。两位作者皆出身贫苦，但是父母一直支持着她们读书，期望教育能让子女摆脱现有阶级。而教育赋予她们的写作能力也是她们记录自我、追到母亲、重塑集体记忆的最佳工具。

2.3. 两者叙述方式相似

非虚构写作通常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关注和描绘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谓的‘中心话语’之外的生活和事件，展现出对中心经验的逃离和偏移”[5]。两部作品都以非虚构式写作方式，讲述时代下母亲身上的平常生活，而并非关于时代下的政治、文化等宏大叙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安妮埃尔诺以女儿为第一人称视角，以对母亲及时代的客观观察与分析，塑造母亲的形象。客观世界中被观察的母亲成为他者，成为当时集体人群中的单个样本。作为观察者的“我”，在记录母亲的客观世界的同时，并不能像上帝一样全然了解母亲思想世界全貌，所以“我”只能尽量将自己样本化，从母亲的角度还原她对生活的思考，以母亲的“他者”形象表达其思想世界，从而将思想世界中母亲的“他者”形象变成了另一个“自我”。在对女儿的“自我”，客观世界中母亲的“他者”，母亲思想世界中女儿的“自我”，三者的记录与思考中，让母亲的形象更加饱满。《秋园》中，杨本芬女士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母亲的一生，将自我和母亲同时置于被第三人称审视的视角，对于记忆之外的情境加以自我想象的补充与修正，全文看似对他者的描述，但是也杂糅了作者自我想象与自我情感倾诉。两位作者在文字中，以客观的非虚构轮廓和局部的虚构想象填补了母亲形象的空缺。

3. 二者女性形象比较

3.1. 母亲悲剧形象比较

《一个女人的故事》以照片为线索，串联了母亲的一生，凸显出文本的真实性书写。母亲出身下层人家，从小便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十二岁辍学在奶油厂打工补贴家用。与同为工人的父亲结婚后，由

于父亲的哥哥在铁路部门工作体面，姐姐们所嫁的对象物质条件良好，他们举手投足显得更有教养，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下等人的习惯，所以瞧不起在工厂做工的母亲。在她们眼中“父亲应该能娶一个更好的”[6]。在战乱中母亲历经逃难生子，为了供女儿读书，起早贪黑照顾家庭和经营杂货店。作者凭借优异的学历，体面的工作以及与上层人士的婚姻，不负母亲所望，跨越了阶级。但是她们的关系却陷入困境，即便女儿在她的教育下迈入上层社会，成为理想中具象化的她，但是母亲却始终无法以同一阶级身份平视这段母女关系。母亲一面欣赏女婿一家人所受的良好教育和高雅气质，一面在女儿家也充满着不自在感与拘束感。一面为女儿成为这样的家庭中一员而自豪，一面担心在这样的家庭会瞧不起她，所以她选择远离女儿，独自生活，最终在疗养院孤独地离去。

《秋园》中，以地理位置为叙事轴线，记录了母亲一生的步履。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一场沉船事故导致家道中落，随后兄长患病，父亲去世，她无忧无虑的童年与读书生涯便戛然而止。因在药店替人抓药，17岁的母亲被身为参谋的父亲看中，母亲以让父亲继续供其读书为条件答应亲事，然而时局动荡，考学遥不可及[7]。全面抗战爆发，随丈夫回湖南乡下后，日常琐事、邻里关系、维持生计这些远比上学更重要，囿于生存，母亲承担了家中大小事务与农活。在饥荒与批斗中，历经丧子与丧夫后，母亲身心饱受摧残，带着两个小孩远走他乡讨生活，在汉川靠着裁缝手艺，生活渐渐好转，攒下一点余钱供孩子上小学。然后一年后，政策要求清理外来人口，为了孩子和生存，母亲不得已改嫁给当地人。命运无常，小儿子中学毕业前溺水身亡，第二任丈夫也在几年后由于疾病去世，六十六岁的母亲再次回到了湘阴，与大儿子和三儿子住在赐福山老屋，直至离世。

3.2. 母亲的自我救赎

对于女性的定义，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以父权社会体系下所塑造的[8]。然而两位作者的母亲却一直在挣脱父权文化对女性精神与身体上的双重束缚。安妮埃尔诺评价母亲：处于社会下层，但是反抗意识最强烈，拒绝别人以家庭出身对她进行评判[6]。在父权掌控的旧时代，她自主选择婚姻；在充满诱惑的糜烂环境中，她洁身自好杜绝一切堕落放纵行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经营杂货店，拥有与丈夫平等的的话语权；在忙碌的生意来往中，时常阅读书籍与报刊以开阔思想，积极面对战争和家庭所带来的苦难。即便内心极度渴望跨越阶级，但是当现实与环境让她意识到自己绝无可能实现时，她选择将自我期望投射到女儿身上，竭尽全力为女儿创造良好教育环境，以女儿的成功来弥补自我遗憾。

杨本芬女士笔下的母亲也是一位与命运抗争的勇敢女性。在家境贫寒而不得已嫁人的时，她将受教育作为婚姻的交换条件，婚后依然想方设法考学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丈夫身患重病无法承担家庭经济时，她扛起养家糊口重担，让每个孩子都能顺利的读书。在由于洪水天灾而不得已流落他乡时，她孤身凭借着裁缝手艺，让孩子在荒年吃饱饭、上中学。她凭借着坚韧勤劳，不卑不亢的走过命运的深谷。与安妮埃尔的母亲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所处的社会早已受到第一次女权运动影响，所以她是更为直观的对父权与夫权的抗争方式来实现自我救赎。而《秋园》中的母亲是中国旧社会里成长的女性，更多的是受到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响，所以她的自我救赎不是直白的与父权对立，而是以至诚无息，博厚悠远的方式默默坚守着生命的尊严。

3.3. 母女关系比较

依据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述，西方女性主义哲学家认为母女关系发展过程的理论模型是：“自童年时期母女相互依恋，至青年期矛盾和冲突的逐渐形成，最终成年期女儿离开，母女纽带彻底断裂”[5]。《一个女人的故事》所呈现的母女关系恰恰如此：儿童时期母亲是女儿世界的中心，认为母亲就是自己

未来所期盼的模样。青少年时期女儿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身上凸显的“他性”使她不再与母亲呈一体性，当母亲无法像从前一样在女儿身上寻找自我分身，这便成了女儿忘恩负义的特点，母亲开始执着地“制服”女儿的逃避意志[8]。彼此之间开始矛盾冲突不断，当母亲对女儿的掌控欲望愈加强烈，窒息的环境也加速了女儿的逃离。但是母亲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女儿身上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我，即跨越阶层的自我，所以为了女儿能拥有比她更好的生活，她倾其所有，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彼此渐行渐远。

《秋园》中的母女关系并未按照西方女性主义哲学家建构的模型演变，虽然二者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代，但是《秋园》中的母女关系呈现的是一种相互扶持的关系。因为《秋园》中呈现的是一种多子女家庭结构，父母与子女不仅有家庭空间交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们也在同样的社会空间活动，所以母亲与女儿在家庭和社会空间能相互交流与理解[9]。例如当母亲被乡邻骚扰后，父亲误以为妻子失节，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由，给她留下一把菜刀自行了断。目睹一切的女儿理解母亲作为父权制家庭与男权性社会中女人生存的不易，与母亲形成了女性的共同体，批判父亲的男权专制意识，为母亲争夺话语权。而安妮埃尔诺作为独女，在母亲的强权控制下，二者的交流仅限于家庭空间，缺乏对彼此社会身份的认知与理解，所以二者的关系走向断裂。

4. 二者主题内涵比较

4.1. 女性书写

吴尔芙认为女性书写语言所侧重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事物存在的状态”，即女性在潜藏的僵化现实下，心理感受到的“生活本身”。这类女性书写语言富有流动性，能够极度延伸以覆盖一些含糊不清的形态。舒沃尔特总结这类语言正是女性通过丰富联想，省略和碎片化的句子实现的，并以此来反对充满主从式、具有严格结构的男性语言[10]。而《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女性书写恰恰如此，开篇葬礼的描写不仅仅是事实的描述，更深入的是我企图通过杂乱的回忆和联想将母亲的一生如电影一般复活在我的笔下。在叙述“过去”时，时常回到“现在”，全篇以多种简短的单句、省略句式和无人称主语句式使文本语言以碎片化方式呈现。同时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以现在的维度透视过去，让叙事结构也呈现碎片化倾向。在自我反思与回忆中这种联想和碎片化巧妙地展示了女主人公心灵的忏悔与自我疗愈。

男性注意力更多倾向于外在现实世界，而女性更倾心于描绘人细致微妙的心理世界。男女不同的倾向对象产生不同的时间概念，对此克里斯蒂娃在《女性时间》中对二者进行区分：男性时间以家族式代代相传呈线性，而女性时间囿于父权制下统一的社会规则与教化，呈现重复性和永恒性[10]。在《秋园》中母女因为父亲去世，都在曾选择中断学业，帮助母亲支撑家庭；在适婚年龄因为对知识的渴望与经济的窘迫，都选择了将求学作为结婚的交换条件；婚后又都因为身份由女儿转变为妻子与母亲，责任与种种生活琐事，让她们无法继续完成学业，命运在母女之间出现了轮回。女儿不仅继承了母亲的血脉，也继承了母亲的命运，在女儿和母亲身份的交互中，女性永恒重复着二者的命运。

4.2. 集体记忆书写

《一个女人的故事》和《秋园》虽然都是在描写母亲，但是两位作者都认为自己不仅在书写母亲，也是在书写那个时代人的集体命运。正如安妮埃尔诺在访谈中所说，写作之于她的意义，是深入社会现实、女性现实和历史现实，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深入到集体经历[11]。所以她在文章中多次使用“nous”（我们）、“on”（泛指人称代词）等词汇来模糊叙事视角，放大叙述人群范围，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形成自我认同与投射。为了强化文本的社会性和集体感，她把目光从家庭琐事和个人情感扩大到对社会日常生活的观察，大量的碎片化社会见闻与成长变化，将容易被大众忽略的家庭小事和当时电视新闻报道的事件这类“小历史”，与宏大社会背景“大历史”串联，还原大众对过往历史的记忆。所以当《一个女

人的故事》出版后，安妮·埃尔诺收到无数读者来信，都说她写的是正是他们父母的故事，是他们自身的故事。

《秋园》中母亲虽然是主要人物，但并非故事的中心而是故事发展的线索，是作者还原上个世纪中国平凡乡间人物命运与沉重历史的入口。在母亲人生轨迹的时空变化中，都有集体人物的命运分支描写。乳腺癌的病痛与恶臭让热情大方的徐娣驰饱受冷眼与折磨，但是她始终保持着最后的体面与尊严，平静的等待死亡；平凡的乡村妇女小泉在嘲笑与挖苦中抚育着有生理缺陷的女儿人王，但是女儿还是在双抢中溺水身亡；母亲身边这些女性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各自经历着不同的苦痛，但是坚韧且隐忍。在叙事语言方面，作者在描写邻里对话时多次使用湘赣方言，口语色彩浓厚。这种现实生活的集体性共同语言让文本叙述更进一步贴近那一带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在《秋园》一书的评论下，不少人认为自己的父辈或者祖辈的命运与书中所描述的人物经历相似。

5. 结语

《一个女人的故事》与《秋园》作为中法两国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代表，在各自的国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二者在形成过程、写作背景和叙述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位作者都以女儿的视角，借用回忆与联想构建母亲的形象。在悼念母亲的同时，以母亲和母亲身边的个体人物命运作为社会集体的样本之一，面对社会动荡与生存境况的困境，以个体在时代下所选择的自我救赎来反映同一时代集体的命运困境与抗争。与此同时，两位作者都采用贴近现实生活的平实语言，书写同时代集体人物的记忆。虽然由于中西方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两部作品在相似的主题与书写方式下呈现出差异性，即两位母亲抗争命运的方式，各自的命运所映射的集体记忆都与各自生活的国家与社会背景对应。但是通过对比分析这两个不同民族作品的渊源与异同，对于两个民族背后所隐含的文化背景，中西方旧时代女性生存与社会人物命运的探寻都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荭. 女性·社会性·互文性——安妮·埃尔诺的自我书写[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59-67.
- [2] 曹顺庆, 徐行言, 支宇, 等. 比较文学[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308.
- [3] 张艺缤. 主题学视阈下《喧哗与骚动》与《台北人》主题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22.
- [4] 郭冰茹. 空间书写与个人生活史的建构——读杨本芬《秋园》系列[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3(1): 73-78.
- [5] 周珏莹. 记忆宫格中的时代与命运——以杨本芬《秋园》为中心[J]. 长江小说鉴赏, 2024(7): 27-31.
- [6] (法)安妮·埃尔诺. 一个女人的故事 全新修订版[M]. 郭玉梅,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79.
- [7] 杨本芬. 秋园[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264.
- [8]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二性 2 [M]. 郑克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614.
- [9] (美)丛小平. 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 1940-1960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462.
- [10] 赵一凡, 张中, 载. 李德恩, 主编, 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925.
- [11] 黄荭, 安妮·埃尔诺. “我写作不求‘再现现实’, 而要追寻现实”: 安妮·埃尔诺访谈录[J]. 外国文学研究, 2024, 46(1): 1-6.